

1949–1950對華政策： 英國、印度與美國的嚴重歧異

• 時殷弘

1949-50年間，美國政府開始推行孤立、削弱和遏制中國的政策，而這種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和取得預期的成效，很大程度取決於英國和印度是否予以協作。英、印兩國是當時中國問題上最重要的「第三種勢力」，是美國政府努力爭取與之一致的主要對象。然而，英、印兩國儘管同新中國有這樣或那樣的矛盾，並且在許多方面需要美國的支持、援助或諒解，但它們分別採取了與美國的意願和要求大相逕庭的對華政策。可以說，英、印與美國之間的此種歧異，構成了中國革命勝利後美國在亞太地區遭到的第一場大挫折，甚或構成了西方集團逐漸走向渙散和中立主義登上戰後國際政治舞台的起點。本文將主要依據美國外交檔案的有關史料，論述英國和印度各自在承認新中國、對華貿易、西藏、台灣以及朝鮮衝突和平解決等問題上同美國的分歧，以彌補國內外有關研究的不足，文末並會論及可以從此項研究導出的某些較宏觀的結論。

1949-50年間，美國政府開始推行孤立、削弱和遏制中國的政策。然而，作為當時中國問題上最重要的「第三種勢力」的英國和印度，卻採取了與美國大相逕庭的對華政策。這構成了中國革命勝利後美國在亞太地區遭到的第一場大挫折，甚或構成了西方集團逐漸走向渙散和中立主義登上戰後國際政治舞台的起點。

同美國的態度相反，英國傾向於承認新中國。這個海外市場和海外資產已急劇減少的國家相當重視對華貿易和在華投資。英國外交部在人民解放軍佔領天津以前就估計，中國共產黨的清明廉潔及其在重建國家方面的緊迫需要，可能使英國在華經濟利益得以維持和發展。華北和江南各大城市解放後保護守法外僑的政策進一步鼓勵了這種觀點。英國政府明白，只有承認新中國，並且與之建立外交關係，才有希望從中國這個「潛在的巨大市場」中得到充分的好處^①。另一重要因素就是香港。1949年1月，英國政府就開始擔心中國共產黨可能用軍事和政治手段迅速使香港回歸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後，內閣急忙研究香港未來的命運，結果斷定無法抵擋中共的大規模進攻。因此，要盡可能長久地保住這個重要的商業和金融據點，就必須同新中國建立較好的關係，至少要使英國能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而且，「香港在供應上對大陸的依賴也確定了與北京建立官方關係的必要」^②。此外，英國面對歐洲的冷戰和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這

兩種形勢都要求盡可能避免與新中國敵對，否則英國及其盟國（特別是美國）會分散在歐洲對抗蘇聯的精力，同時不利於英國調整自己在亞洲的勢力體系。在後一方面，英國特別重視避免在對華政策上同印度分道揚鑣，以免損害當時對它很重要的英印特殊關係^③。

1949年元旦剛過，英國外交部就向美國國務院暗示：英國準備在比較靈活的基礎上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打交道。兩個多月後，它又明確表示想過一段時間即予以「事實上的承認」^④。英國的態度令美國不安。5月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 (Dean Acheson) 着手組織孤立新中國的國際「共同陣線」，英國是他爭取的頭號對象。然而，英國外交部很快正式通知美國：英國在目前中國政府尚未正式成立的情況下贊同美國的政策，但「要拒絕給予一個事實上控制一大部分（中國）領土的政府任何種類的承認，不僅在法理上站不住腳，而且引起嚴重的實際困難」。7月間，艾奇遜要英國外交大臣貝文 (Ernest Bevin) 從對華遏制的角度重新考慮承認問題，並且和他共同組織對付新中國的多邊磋商，結果被婉言拒絕^⑤。8月，人民解放軍逼近廣東，美國採取了更加敵視新中國的姿態，這就促使英國的態度進一步明朗化。是月23日，貝文向內閣報告了美國關閉駐廣州、重慶、昆明等領事館的決定，說英國不應尾隨美國「放棄我們在華的全部利益」，而應「實行我們自己的在中國保留立足點的政策」和準備承認中國新政府^⑥。事實上，英國外交部在一星期前就向美國駐英使館送交備忘錄，主張在新中國正式成立後早日予以承認。美國感到問題嚴重，遂加緊阻撓。駐英大使道格拉斯 (Lewis Douglas) 約見貝文，陳說美英共同孤立新中國的必要。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思 (W. Walton Butterworth) 則在華盛頓同英國外交部高級官員會談，要英國追隨美國，並以承認新中國特別對東南亞英屬殖民地不利來恐嚇^⑦。9月中旬貝文訪美，艾奇遜當面施加壓力。結果，貝文同意「謹慎行事」，並和美國「密切磋商」^⑧。

貝文的讓步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英國政府對中國願與外國建交的表示作出了迅速的反應。10月6日，英國駐北平總領事覆函周恩來外長，提議先行建立非正式關係，以便促進兩國貿易。英國事前不和美國磋商，事後也不通報，美國只是由法國相告才得知^⑨。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對此頗為惱火，覺得英國人捉弄了他，艾奇遜也認為這一舉動違背他不久前和貝文達成的諒解。於是，美英之間展開交涉。美國國務院指責英國言而無信，破壞西方團結，並且要求下不為例。英國外交部一方面解釋致歉，一方面聲稱需要磋商的是「法律上」而非「事實上」的承認。貝文本人還頗不客氣地要道格拉斯轉告艾奇遜：事先磋商不等於取得他的同意^⑩。英國謀求與新中國建立正式關係的進程並未因此事停頓下來。10月間，英國政府宣布已就新生中國內地對香港的供應問題同中國新政府達成了「非常滿意的安排」。與此同時，在廣州的英國使館辦事處不隨國民黨殘餘逃往重慶。英國官方還公開否認了《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在10月中旬的一則報導：英國已向盟國保證不會早日承認新中國^⑪。

隨後，英國朝着與美國相反的方向加快步伐，其駐美使館於11月1日向美國國務院送交備忘錄，表示英國準備「在法律上」承認新中國。備忘錄希望美國同英國一致，否則英國將自行其是。美國國務院對此大為反感。巴特沃思責難英國不提中國須遵守「國際義務」這一承認條件，艾奇遜則向貝文和英國駐美大使弗朗克斯強調，美國「不相信急於承認會給採取這一行動的人帶來任何長久的好處」^⑫。英國政府不為所動，於12月15日決定翌年1月初承認新中國。艾奇遜仍不

英國政府明白，只有承認新中國，並且與之建立外交關係，才有希望從中國這個「潛在的巨大市場」中得到好處。1949年元旦剛過，英國外交部就向美國國務院暗示：英國準備比較靈活地同中國共產黨的新政府打交道。兩個多月後，又明確表示想過一段時間即予中國「事實上的承認」。英國的態度令美國不安。

死心，要貝文把承認時間至少推遲到越南保大傀儡政權粉墨登場之後，以免損害「抵制共產主義蔓延」的事業^⑬。此時緬甸已經承認新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幾天後將採取同樣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稍事拖延也是英國所不願意的^⑭。1950年1月6日，貝文通知周恩來：英國政府聲明撤銷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⑮。英國的舉動影響重大。十天內錫蘭、挪威、丹麥、阿富汗、芬蘭、瑞典和瑞士政府相繼承認新中國，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則於3月底起而仿效。美國孤立新中國的圖謀近於全盤失敗。

二

在中國問題上，印度對美國的重要性僅次於英國。艾奇遜在1949年7月間決定遏制新中國後不久，便設想由印度出面，倡導亞洲國家和美英法荷澳一起組成反華包圍圈^⑯。

但是，他的籌劃失算了。雖然國大黨政府懼怕中國革命影響及於印度，並且擔心強大統一的中國會妨礙它維持和擴展境外勢力，然而使印度新近獲得獨立的反殖鬥爭的領導者們，對中國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的枷鎖不無同情和敬慕。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認為，亞洲正處於覺醒的時代，印度獨立和新中國誕生是這個新時代的兩大標誌^⑰。在他看來，美國敵視和孤立新中國表現了西方大國對亞洲人民的傳統態度，印度不應當盲目追隨其後。同樣重要的是現實利益的考慮。尼赫魯當時認為，印度和中國是亞洲兩個最大的彼此接壤的國家，「如果兩國的關係不好，就將……長遠地影響我國的未來」，甚至造成毀滅性的「反覆的戰爭」。要避免這樣的危險，印度首先必須從接受「歷史重大事件」的現實出發承認新中國。同時為了用外交手段保護印度在西藏的既得利益，也需要這麼做^⑱。

當1949年5月艾奇遜着手組織不承認新中國的國際陣線時，印度的態度就令他頭疼。印度外交部一會兒說「完全同意」美國的主張，一會兒又說希望保留自由迴旋的餘地，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 (K. M. Panikkar) 則向留在南京的外國使節強調應當迅速承認新中國。雖然美國駐印使館竭力謀求印度明確支持美國，但到9月它已不得不認為「一旦中共政權牢固地控制了中國……印度政府就會準備承認」^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兩個星期，印度政府便宣布：已通知中國政府印度正在研究承認和建交問題^⑳。這是走向承認新中國的第一步。與此同時，尼赫魯訪問美國。他在會談中表示，承認新中國不可避免，而早承認比晚承認好。杜魯門和艾奇遜十分不滿，強調應當按照美國的立場協同動作，但尼赫魯堅執己見^㉑。11月22日，印度政府通知美國：印度準備在年內承認新中國。對此，美國國務院向印度大使潘迪特 (Vijaya Lakshmi Pandit) 夫人表示不滿，告誡印度急於承認有弊無利^㉒。美國的阻撓鼓勵了當時印度政府內以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帕特爾 (Vallabhai Patel) 為首的右翼勢力。11月初，帕特爾就要求尼赫魯在考慮承認問題時「認真關注」所謂中國對南亞的威脅，並且背着尼赫魯和外交部同美國使館商談阻撓承認。在政府表明年內承認新中國的意圖後，他又要求尼赫魯拖延此事，但被婉言拒絕^㉓。12月30日，印度政府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美國在亞洲的一次重大失敗。

艾奇遜在1949年7月間決定遏制新中國後，便設想由印度出面，倡導亞洲國家和美英法荷澳一起組成反華包圍圈。然而使印度新近獲得獨立的反殖鬥爭的領導者們，對中國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枷鎖不無同情和敬慕。尼赫魯認為，美國敵視和孤立新中國表現了西方大國對亞洲人民的傳統態度，印度不應當盲目追隨其後。

1949年3月初，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解放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下，杜魯門批准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綱領——國家安全委員會41號文件。這個文件規定嚴格管制對華出口。管制內容為：對軍事裝備和其他所有直接用於軍事的物資實行禁運；對輸出非軍用戰略物資實行嚴格的數量限制；所有對華出口須經商業部許可，以便根據「戰略考慮」予以批准和拒絕²⁹。事實上，非軍用戰略物資被規定得十分廣泛，包括多種工作母機、精密儀錶儀器、電子器材、機動車輛和車廂、化工產品和設備、鋼材、有色金屬、發電輸電設備、石油產品等等。一句話，構成一國工業能力的一大部分物質要素³⁰。

像在承認問題上一樣，美國最關心英國的態度。英國是美國以外最大的對華出口國，又是一個有能力提供資本貨物的工業發達國家。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一向起着西方對華貿易的重要樞紐和中轉站的作用。沒有英國的合作，美國的貿易限制就很難奏效。3月下旬，美國國務院把國家安全委員會41號文件的精神以及管制對華出口的方法告訴英國使館，要求英國採取同樣措施，特別是嚴格限制香港對中國大陸的出口³¹。但是，英國很不情願這麼做。早在兩個多月以前，英國使館就向美國國務院詳細論證了對華貿易對英國的重要意義，並且認為西方國家和新中國貿易的前景並不暗淡³²。4月初，英國外交部作出初步答覆，強調英國將盡可能維持在中國解放區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利益，要求美國在「共產黨人開始對外國經濟利益採取確鑿的侵犯行動」以前不施加經濟壓力。為了不過份得罪美國，它表示可以考慮禁運軍事物資，但這必須以其他西方國家協同行動為條件³³。此後兩個多月裏，雖然美國方面多次勸說，但仍未得到英國任何明確支持³⁴。6月21日始，美國國務院和商業部代表同英國政府官員在倫敦會談。結果，英國方面答應禁運軍事物資，但不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在這方面同中國大陸的轉運貿易，除非法國、荷蘭等國及其遠東屬地也這麼做。至於非軍用戰略物資，除石油產品外，英國拒絕施加限制³⁵。艾奇遜對此大為不滿，他要駐英大使館告誡英國外交部：英國的態度將使西方喪失保護它在中國和遠東利益的最重要手段。然而，英國政府非但未改變立場，反而於9月中旬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備忘錄，批評美國政策的指導思想，說把貿易用作對付共產黨的政治武器徒勞無益³⁶。與此同時，艾奇遜和貝文在華盛頓會談，限制對華出口是議題之一。會談未使英國在這方面更接近美國，艾奇遜不得不承認兩國的分歧難以彌合³⁷。

在如何對待國民黨1949年6月下旬起對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沿海進行海上封鎖的問題上，英國也表現出同美國大不相同的姿態。美國政府的態度是積極縱容和配合。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斯普勞斯(Philip Sprouse)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在封鎖開始不久欣喜地說：對上海的封鎖正在給中國共產黨造成日益嚴重的困難，它們和其他方面的經濟困難相結合，「可望阻撓共產黨鞏固其統治，導致共產黨的力量越來越多地用於維持後方秩序，最終削弱其南進勢頭，並且降低共產黨在中國和東亞的威望」³⁸。但是，英國的政策卻相反。7月下旬，英外交部建議英美合作向上海運送救濟物資，以防該市發生可能危及外國人的經濟崩潰或騷亂。它特別要美國方面考慮對國民黨施加外交壓力或派海軍護航，以便載運救濟物資的船隻駛入上海。但是，這個主張立即遭到美國國務院拒絕³⁹。10月間，

1949年3月初，杜魯門批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綱領，嚴格管制對華出口。但是，如果沒有英國的合作，美國就很難達到目的。3月下旬，美國國務院要求英國採取措施，嚴格限制香港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此後兩個多月裏，雖然美國方面多次勸說，但仍未得到英國任何明確支持。英國政府更於9月中旬批評美國政策的指導思想，說把貿易用作對付共產黨的政治武器徒勞無益。

英國不顧美國反對，決定為駛往中國大陸港口（主要是上海）的英國商船提供護航。在杜魯門看來，這是個「最令人不快的事態發展」^⑤。

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中央指示人民解放軍準備進軍西藏，同時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噶廈）派代表到北京談判和平解決辦法。噶廈對此非常恐慌。1949年11月2日，它致函毛澤東，以獨立國家政府的姿態，要求保證沒有任何「中國軍隊跨過西藏邊界」，並聲稱「被兼併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的那些西藏領土」應在中國內戰後通過談判回歸西藏^⑥。兩天後，它派代表向美國駐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遞交致艾奇遜函，請美國在人民解放軍進藏時援助藏軍抵抗。它同時還向英國和印度政府提出了類似的請求。12月，它又分別致函艾奇遜和杜魯門，要美國轉達並幫助西藏實現加入聯合國的申請，並且希望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和派使團赴美求援^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中央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噶廈）派代表到北京談判和平解決辦法。1949年11月噶廈致函艾奇遜，請美國在人民解放軍進藏時援助藏軍抵抗。美國政府也企望阻止西藏解放，並謀求印、英兩國合作。但是，印度不想為西藏問題損害中印關係，英國的態度與此相似。

美國政府企望阻止西藏解放。美駐印和駐英使館奉國務院指示分別與印、英兩國外交官員協商，謀求他們的合作。但是，結果令國務院失望。印度當時雖然對西藏不無擴張主義圖謀，但它更希望與新中國友好相處。亨德森向艾奇遜匯報說，印度不想為西藏問題損害中印關係，竟否認接到過噶廈請示軍援的函電^⑧。英國的態度與此相似。它由於印度獨立而喪失了在藏特權，支持噶廈分裂主義不僅不會給自己帶來多大實惠，反而將得罪中國，損害對華貿易和香港的前景。因此，英國外交部一邊故作姿態地表示「支持印度的任何旨在保護西藏自治的行動」，一邊卻告訴美國，印度必然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不會採取與中國對抗的行動。在西藏加入聯合國問題上，英國向美國表示，蘇聯必定否決噶廈的申請，因而應當通過印度向噶廈說明申請加入聯合國不可行^⑨。

美國國務院仍不罷休。12月上旬，艾奇遜授權亨德森告訴西藏噶廈：美國將仔細考慮西藏加入聯合國的請求，但無論在地理上或傳統上西藏與印度和英國的關係都比美國密切^⑩。這是向拉薩方面暗示，應當對印度和英國做工作，而不宜由美國單獨或直接出面予以支持。然而，新德里傳來的消息繼續使國務院感到沮喪。亨德森在與印度外長梅農（V. K. Krishna Menon）和英國駐印副高級專員羅伯茨（Frank Roberts）交換意見後，向艾奇遜報告說，他們都認為西藏不可能被接納進聯合國，而聯合國就此進行的辯論反而會「過份地激起西藏問題，可能促使中共更早地行動」。至於如何對待噶廈派人赴英求援，梅農認為它可以通過印度與英國駐印官員聯繫，不應當直接前往英國^⑪。

鑒於英印兩國不願與美合作，美國政府只能暫時中止在西藏問題上的密謀活動。12月下旬，艾奇遜指示亨德森以非正式方法向噶廈示意，不要派代表團前往聯合國申請席位。三個星期後，他又要亨德森敦促噶廈不要派人赴美求援。接着，他決定放棄向西藏派遣領事人員的打算^⑫。亨德森在當時的一份電報中道破了美國的難處。他說，支持噶廈的外交表示會使它以為美國將援助抵抗中共進軍，而這是美國由於地理和軍事限制所難辦到的^⑬。

1950年春，人民解放軍開始向西藏進軍，噶廈則在昌都集結藏軍主力準備決戰。這一形勢又使美國政府動作起來。3月1日，艾奇遜要亨德森試探假手印度

向噶廈提供軍援的可能性。亨德森回電認為，美印合作不可能令人滿意，因為印度不肯同美國一起反對中國。他還說，即使印度願意援助噶廈，也只會限於提供它自己的物資^④。艾奇遜還不死心。6月中旬，他請英國政府敦促印度：「悄悄地」向噶廈提供軍援。然而，英國政府強調自己「在藏利益極為有限，沒有必要介入中國內政」，態度十分冷淡^⑤。如此一再碰壁後，艾奇遜又指示駐印使館鼓動噶廈向印度施加壓力，促其轉運美援，或進一步提供印援。可是，印度仍不願過多地插手^⑥。10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昌都，美國政府只能望洋興歎。

五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立即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並且宣布了「台灣地位未定論」。這一對中國內部事務的武裝干涉，即使在支持美國侵略朝鮮的國家中也引起了強烈不滿。英國是其中最重要的國家。它一再向美國政府表示，英國在朝鮮問題上支持美國並不意味着在台灣問題上也予以支持。英內閣實際上接受了參謀總部於6月底提出的主張：英國不應以任何方式介入保衛台灣和針對新中國的其他行動^⑦。英國政府擔心，儘管美國已宣布將用武力阻止大陸進攻台灣，但中國共產黨仍有可能攻打該島。而且，美國武裝干涉台灣引致中國極為憤怒，加強中蘇團結，這就有可能促使中國出兵朝鮮。在這兩種情況下，中美衝突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將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美國可能因此把主要力量集中於遠東，削弱北約對付蘇聯的能力，從而損害英國最重要的戰略利益^⑧。此外，保留離間中蘇關係的可能性、維護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利益以及與亞洲英聯邦的關係等項考慮，都促使英國不贊成美國干涉台灣^⑨。

朝鮮戰爭爆發後的一個月裏，台灣問題幾乎是英美之間外交活動的焦點。7月6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Andrei A. Gromyko)約見英國駐蘇大使凱利(David Kelly)，表示蘇聯希望和平解決朝鮮衝突，問英國就此有何建議。貝文得到匯報後十分重視，立即通報艾奇遜，並且向他強調應當積極、仔細地考慮蘇聯的試探^⑩。台灣問題被貝文當作實現和平解決的關鍵之一。他認為，如果蘇聯確實準備促成朝鮮恢復戰前現狀，那麼它幾乎肯定會把停止美國在台灣海峽的武裝干涉作為一個條件，而英國應當促使美國作此讓步。7月7日，他指示駐美使館轉達他對美國對台政策的批評，請美國政府考慮改弦易轍，以便結束朝鮮衝突。貝文的請求使艾奇遜大為惱火。在他看來，這簡直就是「投降」。他以強硬的措辭函告貝文：「如果聯合國允許侵略者插入其他問題並榨取讓步，以此作為停止無法無天行動的條件，那麼聯合國和自由世界阻止侵略的能力將徹底喪失。」鑒於美國頑固，英國只得向蘇聯表示不能提出和平解決的具體建議^⑪。但是，倫敦對華盛頓的不滿依然如故。7月15日，貝文致函艾奇遜，詳細闡明並表示將堅持英國關於台灣的立場，要求美國公開澄清對台政策。主要由於英國的壓力，杜魯門於四天後發表諒文，宣稱美國對台灣沒有領土和特權野心，台灣的「軍事中立化」不表示美國對該島的政治問題有所成見^⑫。然而，這不能使英國放心。到8月底，它還在警告美國台灣問題可能引起和中國的戰爭^⑬。

新德里的態度和倫敦相近。印度政府一方面把武裝干涉朝鮮當作「抵抗侵略」，另一方面認為美國與此同時用武力阻止台灣解放和加緊在印度支那援助法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立即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並宣稱「台灣地位未定論」。這一武裝干涉，引起英國強烈不滿。防止美國將主要注意力偏離歐洲、保留離間中蘇關係的可能性、維護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利益以及與亞洲英聯邦的關係等項考慮，使英國不贊成美國干涉台灣。朝鮮戰爭爆發後的一個月裏，台灣問題幾乎是英美之間外交活動的焦點。

印度政府一方面把武裝干涉朝鮮當作「抵抗侵略」，另一方面認為美國與此同時用武力阻止台灣解放和加緊在印度支那援助法國人，是「幫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反動力量」。這既可能使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重新成為亞洲大陸的支配勢力，也可能使印度不得不放棄中立主義。

國人，是「幫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反動力量」^⑥。尼赫魯在6月底告訴美國大使亨德森：印度希望和中國發展友好關係，如果支持美國關於台灣的決定，那就不可能有這種關係了；不僅如此，印度政府這麼做還會加劇國內左翼力量的批評^⑦。對於朝鮮戰爭本身，印度政府也深感不安，擔心它會愈演愈烈，甚至擴大為西方大國反對新中國的戰爭。這既可能使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重新成為亞洲大陸的支配勢力，也可能使印度不得不放棄中立主義。因此，尼赫魯在宣布接受要求援助南朝鮮擊退進攻的聯合國安理會6月27日決議時聲明：印度政府的這個決定並不意味着它改變和平中立政策，它希望有可能通過調解解決朝鮮衝突^⑧。

7月1日，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向中國副外長章漢夫提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得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及蘇聯結束對安理會會議的抵制為前提，通過安理會內外的磋商謀求和平解決朝鮮衝突。隨後，印度政府又對美蘇兩國進行了試探^⑨。印度的建議雖然沒有直接提到台灣問題，但如學者惠廷(Allen Whiting)說，印度顯然認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接納入聯合國，連同朝鮮戰爭的解決，華盛頓就沒有甚麼理由繼續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了。」^⑩7月10日，章漢夫向潘尼迦表示，中國政府讚賞印度在中國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的立場，同時認為這個問題應當和朝鮮問題分開考慮^⑪。以此為基礎，尼赫魯於7月13日分別致函斯大林和艾奇遜，正式提出印度的上述建議。斯大林迅速表示歡迎。中國報刊稱讚這是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合理建議，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⑫。但是，美國政府拒絕照此辦理。早在7月初，國務院就鑒於印度可能提出這類主張而指示駐聯合國代表團：若有在安理會提出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跡象，即應堅決反對，並且可表示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更加反對中國席位改變^⑬。台灣問題則是決定這一立場的重要因素。駐英大使道格拉斯當時向英國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解釋說：「如果共產黨中國成為安理會成員，它對台灣的要求權就很難拒絕，美國處境將變得極為困難。」^⑭7月18日，印度外交部得到了艾奇遜給尼赫魯的答覆，內稱結束「北朝鮮侵略」必須是無條件的^⑮。幾天後，艾奇遜對澳大利亞總理孟席斯(Robert G. Menzies)說，尼赫魯的行動造成了很大損害，其後果目前還無法估量^⑯。他所說的損害，無疑包括支持美國武裝干涉朝鮮的國際陣線暴露出顯著的裂痕。這是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態。

六

從1949-50年間英印兩國在中國問題上同美國的嚴重歧異，可以導出某些較為宏觀的結論，它們對於正確判斷當時東亞甚或更大範圍內的國際政治格局及其性質幾乎必不可少，或者說可以為準確估量新中國成立時所處的國際環境提供重要啟迪。這一國際環境的主要構成無疑是美蘇兩個陣營及其對立。美蘇在歐洲冷戰早已形成，並且已經由於德國的正式分裂、東歐的徹底蘇聯模式化和北約的建立而進入其最高潮，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才步入局部緩和與冷戰對抗兩相摻雜的新階段。此外，東亞冷戰也已開始形成：美蘇兩國已在日本、朝鮮和中國問題上尖銳對立，並已擁有各自在東亞的聯盟(特別是一方面的美日、美韓聯盟和另一方面的蘇中、蘇朝聯盟)，不管它們是否已發展到正式的軍事同盟形態。然而，像當時和後來的許多人那樣，將這些當作新中國成立時所處國際環境的唯

一(或唯一重要)構成，是不正確的。有如本文和其他類似的研究^⑥所展示，美國在歐洲的盟國並非就是它在東亞所有重要問題上的盟國。或者說，在美蘇冷戰和非西方世界空前的變革大潮開始洶湧澎湃這雙重的國際背景之下，在歐洲的英國並非就是在東亞的英國，有如同樣可以證明在歐洲的法國與荷蘭並非就是在東亞的法國與荷蘭。不僅如此，隨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擺脫殖民統治的東亞和南亞新獨立國家以印度為首要代表，並未在根本態勢方面從屬於世界政治的兩極化，並未將對外政策完全囿於親美或親蘇的狹隘限界之內，即使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它們在美蘇兩極間有這樣那樣不同程度的偏向。美國方面杜魯門牌號的「自由對極權主義」世界政治模式和蘇聯方面斯大林—日丹諾夫牌號的「兩大陣營論」分別表明，美蘇兩國都沒有準確地認識東亞國際政治中的這一重要新力量，而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當時由於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種種原因大體上也是如此。總之，東亞即使在歐洲冷戰的最高潮時期，也不是像歐洲那樣大致完全的兩極格局，而是存在着對中國和東亞問題影響重要的其他多少獨立的國際政治力量^⑦。

這種與兩極圖景很不相同的1949-50年的情況在中國問題上開始顯現出來，並且將逐漸發展。關於如何對待新中國的英美歧異構成了英國此後在東亞同美國持續齟齬的起點。從何時和如何結束朝鮮戰爭，到是否應當武裝干涉印度支那戰爭，再到如何對待越南戰爭——20餘年裏英美兩國政府在東亞重大問題上幾乎難得一致。不僅如此，本文闡述的事態之後不久，美國與其西方盟國的嚴重歧異開始發生在聯盟全球事務的核心領域，那就是斯大林去世引起的關於對蘇外交基本態勢的英美分歧。此後便有關於蘇伊士運河戰爭的美國—英法對立、戴高樂執政後的美法牴牾、乃至第二次柏林危機引起的美英—西德疏離^⑧。同樣從新中國問世時的印度外交開始，亞洲、後來還有非洲的新獨立國家越來越表現為中立主義的、互相間大致團結的世界政治角色：取其大者而言，首先是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後亞洲阿拉伯國家結成主張盡早結束這場戰爭的某種外交聯合，然後是萬隆會議的成功舉行，再到不結盟運動的出現和壯大。冷戰在歐洲以外越是擴展，世界政治中的中立主義潮流就越是顯著。

新中國成立時的上述國際環境同其他類似的歷史實例在一起，表明即使在一個兩極化程度很高的國際體系內，即使是一個非常激進和業已站隊的國家，在體系陣營之外往往仍遠不是全然孤立的，仍有爭取朋友和利用矛盾的外交餘地。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世界政治觀及其有關政策同這麼一種現實之間有不小的距離^⑨，這是新中國外交史上值得記取的教訓。錯誤的原因固然包含各種應當理解的環境因素，它們要求對這錯誤予以公允的諒解。但是，不應當以環境因素來說明一切，因為特別有力的一項理由在於：同樣在當時的國際總體環境中，有人(首先是鐵托 [Josip Broz Tito] 為首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人) 比我們認識得更好，也做得更好，有如當時英國比之於美國那樣。

即使在冷戰的最高潮時期，東亞也不是像歐洲那樣大致完全的兩極格局，而是存在着對中國和東亞問題影響重要的其他多少獨立的國際政治力量。美國方面杜魯門牌號的「自由對極權主義」世界政治模式和蘇聯方面斯大林—日丹諾夫牌號的「兩大陣營論」分別表明，美蘇兩國都沒有準確認識東亞國際政治中的這一重要新力量。

註釋

①②④⑤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9, vol. 9 (Washington, D.C.: GPO, 1974), 4-5, 59; 6-7, 82-83; 1-5, 11-12; 23, 26, 50-52; 56-57, 60-61, 68-70, 76-78; 81-85, 88-91; 103, 108, 118-19; 109-10, 118-19, 120-21, 134-35; 149, 150-54, 189, 219; 224-26, 241-42; 51; 29, 44, 70-71, 73;

127; 124-25, 127-28; 196, 213-14, 221; 165-67; 835; 857-59; 834-37; 817-21; 837-40; 846-54; 856, 861-63, 860-67, 870; 867-68, 857-78; 82-83, 880-85; 106, 1109-10; 1122-25; 1147, 1150-51, 1157-59; 1081; 1092-93; 1086, 1091; 1090-91; 1091-92; 1092-93.

③ D. C. Watt, "Britain and the Far East", i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ed. Yo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iy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6-97.

⑥ 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76), 171-72.

⑪ 同註⑥書，頁24、35；Evans Luard, *Britain and Chin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2), 77。

⑭ 英國外交部國務大臣楊格(Kenneth Younger)後來就此說道：「由於英聯邦將在承認問題上分裂若干時間，政府決心不讓這一種分裂沿種族界線進行。」見同註⑥書，頁42。

⑮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1949-1950)》(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頁19-20、122。

⑰ Jawaharlal Nehru,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1949-1953*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54), 137; K. Subrahmanyam, "Nehru and the India-China Conflict of 1962",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Nehru Years*, ed. B. R. Nanda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76), 107.

⑱ R. K. Jain, ed., *China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 vol. 1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1), 45-46；同註⑩Nanda，頁147。

⑳ 同註①，頁1081-82、1084-85、1087-8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6 (Washington, D.C.: GPO, 1976), 275-76；Joint Secr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ibet to President Truman, 22 December 1949, OF, Box 635, Harry S. Truman Papers, Harry S.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issouri.

㉑ 同註①，頁1096-97；註㉑*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6，頁275-76、285、286。

㉒㉓㉔ 註㉑*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6，頁314、318；330-31、264-365；386、424-25、430、440、540-41。

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Washington, D.C.: GPO, 1976), 361, 369, 419; 397-98, 462-63; 361-62, 396-98; 312-14; 329-31, 347-51; 395-99; 464-65; 218; 235-36; 284; 284; 331; 412-13, 17.

㉞ R. K. Jain, ed., *China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 vol. 1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1), 135-36.

㉟ Alle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59；同註㉞，頁283-84、310、341。

㊱ 同註㉟Whiting，頁60。

㊲ *New Times* (Moscow), no. 32 (9 August 1950), appendix 1；《人民日報》，1950年7月21日；《世界知識》，第22卷第2期(1950年7月21日)，社評，頁2。

㊳ Gaddis Smith, *Dean Acheson* (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72), 195.

㊴ William W.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㊵ 參見時殷弘：〈與複雜局勢相違的簡單化政策——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的安全政策〉，《美國研究》，1997年第2期。

㊶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chap. 20, 21, 23, 24.

㊷ 見時殷弘：《敵對與衝突的由來——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和中美關係(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09-11。